



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李相银 著

雨水像马蹄疾驰而去，草坪、树林、山隘升起乳白色的雾气，天空大亮，辽阔而寂静。在这梦境的尽头，疯狗左手执矛，右手扶膝，坐在还积着水的石头上，一动不动。疯狗的名字起源于一场战争。当时他操起一根木棍，在人肉丛中打出一条开闢的道路。及至他冲到路的尽头，战争便结束了，敌我双方垂下紧握兵器的手，静静看着他像敲碎一只椰果，轻巧地敲碎首领的头颅。当血从额头流下，首领的双眼像擦燃的火苗猛烈地燃了，可疯狗还是扑上去，压倒他，从脖颈处咬下一块肉来，疯狗被戴上插满羽毛的头盔，被载歌载舞地庆祝了一夜，从此落群了。那些过去对他毫无防范甚至有些嘲讽的目光，如今都惴惴不安，好像老鼠被逼到了角落。疯狗试图上前那些人便跑了，姿势和当时的敌人一样。也许英雄都有这样的遭遇，英雄抹平了敌我双方的区别，成为人类共同的心病。疯狗后来用双手按住山寨里一个白发苍苍老人的肩膀，要他讲述世界自有人以来的传说，而后者只是凄惶地摇头。那些飘扬于历史的家园守卫者，其臂力及对弓箭出入化的运用，曾被夸张地演绎，可在眼下的疯狗面前，不过是些渺小而空洞的陪衬……谁都能看到疯狗吐下那块肉时眼放磷火的场面，那并不意味着一个强悍的敌人消失了，而是意味着一个难以制服的恶魔降临了。那场战争不过是为了几颗该死的玉米。疯狗试图证明自己的善良，可即使人们越来越惊惶，那些本应与勇士紧密相连的女人，也摆出随时赴死的架势。疯狗曾经想废掉自己，以便像个懦弱的小丑被小富即安的人们抚摸，但是他听到体内的血液在坚决地歌唱，它们在寻求释放，释放是他唯一的欲望。他丢下尖石，有力地站起来，抓起弓箭和长矛，走出茅屋，走出村寨，从此将自己放逐在路上。在密林穿越时，他曾经被巨蟒缠住，好像被根藤条箍死了，往天空无望地飞，可是那令自己也惊惧的力量还是从身体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处毛孔喷涌而出，他像拟上稻草一样掀开蟒蛇，然后追上去一脚踩碎那还在吐信的头颅。在路过山岗时，他一拳打中猛虎的下颌，枕着他凄惶地睡了一夜。他找不到合适的敌人，他的存在越发地无意义，他是无目标的活死人，丧家的狗。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人。那个老人梳着女人的头发，额头和嘴角布满皱纹，一双眼睛盯定了一般，看着对面树叶上铺洒的阳光。疯狗走过去了，老人忽然说：你将死于雨后，死于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人之手。疯狗走回来，老人仍然看着对面树叶上铺洒的阳光，疯狗伸手过去晃了晃，那双眼睛并不眨动。是个瞎子，可是咒语不就是这些人做出的吗？疯狗说：你说什么。老人却是抿着高傲的嘴唇，像块岩石坐着。疯狗朝着南方继续走，走了好些天，好些夜，不知不觉穿越草坪、树林和山隘，来到一个熟悉的山寨面前。从山岗上远眺，那里左边窝着几十座茅屋，右边窝着茅屋十几座，却不正是自己离开的地方吗？这么说，回到了故乡？可是故乡明明是在北方。疯狗继续朝前走，感触到河流透着往昔一般的凉气，石尖在路间适宜的位置冒出，牲畜的粪便也遗落在相同的树前，就连路人也是一般。他们长着和疯狗记忆一样的面孔，穿着和疯狗记忆一样的衣服，露出和疯狗记忆一样的眼神。他们匆匆避开，团聚在一堆，仓皇地说：原来不是我们这的恶狗。疯狗的心明亮了，按照上苍的旨意走进一所宽敞的茅屋，就好像走进一个黑洞。黑洞里有个东西蠕动了一下，等到疯狗的眼睛适应屋内环境后，那人也从吊床上翻下来，站在对面，瞪着巨卵般的眼球，紧和着浅薄的唇线，山岩般的鼻子正往下呼呼喷气。疯狗一下看到了自己，可是在这短暂的熟悉以及奇异感杀过后，后边汹涌而出的却是巨大的陌生和羞惭。疯狗不知如何自处，如何开口，总算阖了下眼皮，盖住那巨卵般的眼球。他才笑着说：看来真有个一模一样的我。对面的人也魅力笑了，说：不是做梦吧？我也受了启示，也要去找你的疯狗说：不是梦，是真的。说完这话，疯狗忽然意识到什么。待要出手，对方的牙尖已伸到喉口。疯狗呼呼呼噜了几口气，虽然就醒了他看了看四野，四野已被浓云盖起来，山峰和树木变成深灰色的影子，远方有闪电像蜥蜴的舌信猛伸出来。后来……雨水像马蹄疾驰而去，草坪、树林、山隘升起乳白色的雾气，天空大亮，辽阔而寂静。在这梦境的尽头，疯狗左手执矛，右手扶膝，坐在还积着水的石头上，一动不动。他在想自己注定要和那个叫恶狗的人决一死战。恶狗会坐在远处的某块石头上，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这样的路程也许很远，但是两个有力的人相向而走，就用不了多久。汇合点也许是个开闢的平地，也许是个局促的山凹，也许是条河流，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同时看到涂满毒药的箭头飞向自己的眼窝，同时看到磨得发亮的牙齿扎向自己的心脏。也许恶狗将死掉，也许疯狗将死掉，也许都得死。但是死亡并不可怕，活着也许比死去更凄寒。那就走吧。疯狗摸下鼻环，扯掉腰间湿透的兽皮，挺长矛，背箭袋，赤身裸体地向密林深处走去。大颗的雨滴还在斑驳的树皮上慢慢往下滑，一些虫开始叫起来。巨足在泥窝里踩出噗噗的声音来。走了一阵，疯狗的脚步轻起来，有时他甚至还爬在地上，卧听是不是有强悍的脚步声传来。可是他什么也没听到，对方和自己一样兴奋而狡猾。疯狗在意识到可能的葬遇后，将握着的长矛提起来举在肩上，他想在第一眼看到恶狗后，自己应该是一个弓步，接着将长矛投掷出去，然后再躲藏在什么东西后边，将扣搭箭。他这样想，心跳密起来，呼吸喷动，好似世界的时间越来越少。终于走到林间一个开闢地时，对面林丛的鸟儿扑喇喇飞了。来了，恶狗惊动了这些迎面而来的鸟儿，他的智慧上海三所书店到林里，却又不知如何力量拉到阔地中央，在那里他朝天望云。他看到了此生没见过的东西，看到了传说没出现过的东西。一只房屋大的，长着平坦而规整的腹部，腿粘在一起，正依靠着圆圈的翅膀将自己青黑色的身躯悬滞在空中。翅膀发出巨大声响，



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李相银 著



雨水像马蹄践地而去，草坪、树林、山隘升起乳白色的雾气，天空大亮，辽阔而寂静。在这梦境的尽头，疯狗左手执矛，右手扶膝，坐在还积着水的石头上，一动不动。他想起源于一场战争，当时他像一根木桩，在人们丛中打出一条开阔的道路，及至他到路的尽头，战争便戛然而止。他静静地看，像欣赏一只蝴蝶，轻巧地敲碎首领的头颅。当血从额头流下，首领的双眼像蝴蝶一般，慢慢地闭上了。他压倒他，从脖颈处咬下一块肉来。疯狗被戴上插满羽毛的头盔，被载歌载舞地庆祝了一夜，那快乐对他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有些嘲弄的目光，如今都像枷锁不安，好像老鼠被碾到了角落。疯狗试图用那些人的便溺，来洗刷那些对他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也许美，也许是那样的遭遇，英雄抹平了敌我双方的区别，成为人类共同的心胸。疯狗后来用双手按住山崖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要他讲述世上有人以来的传说，而后者只是凄惶地摇头。那些飘摇于历史的家园守卫者，其臂力及对弓箭的融入化入他，像一块块积木，在眼下的疯狗面前。不过是一些渺小空洞的陪衬……谁都看到了疯狗吐下那块肉时眼放晴火的灿烂，那意味一个小小的胜利，可是，而是意味着一个难以制服的恶魔降临了。那场战争不过是为了几颗该死的玉米。疯狗试图证明自己的存在，可是，那从未燃起恨，那些本应与勇士紧密相连的女人，也摆出随时赴死的架势。疯狗曾经想杀掉自己，以便像个小懦弱的小丑被小富婆安的人们抚摸，但是他听到体内的血液在坚决地歌唱，它们在寻求释放，释放是他唯一的欲望。他丢下尖石，有力地站起来，抓起弓箭和长矛，走出茅屋，走出山寨，从此将自己放在路上。在密林穿梭时，他曾经被巨蟒缠住，好像被巨蟒吞能死了，往天空无望地飞，可是那令自己也俱惧的力量还是从身体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处毛孔喷涌而出，他像撒开稻草一样撒开蟒蛇，然后追上去一脚踩在那还在吐信的龙头。在路过山岗时，他一拳打中猛虎的下颌，伏着它凄惶地睡了一夜。他找不到合适的敌人。他的存在超越地无意义，他是无目标的活死人，夜家的狗。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人。那个老人扶着女人的头发，额头和嘴角布满皱纹，一双眼睛入定了一般，看着对面树叶上铺洒的阳光。疯狗走过去了，老人忽然说：你将死于面后，死于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人之手。疯狗走回来，老人仍然看着对面树叶上铺洒的阳光，疯狗伸手过去晃了晃，那双眼睛并不眨动，是个瞎子。可是瞎子不就是这些人做出的吗？疯狗说：你说什么。老人却是推着高微的嘴唇，像块岩石坐着。疯狗朝着南方继续走，走了好几天，好些年，不知不觉穿越草坪、树林和山隘，来到一个熟悉的山崖面前。从山岗上远眺，那里左边窝着几十座茅屋，右边窝着十几座，那不正是自己离开的地方吗？这么说，回到了故乡？可是故乡明明是在北方，疯狗继续朝前走，触碰到河流透透往昔一般的凉气，石尖在路间通宜的位置冒出，牲畜的粪便也遗落在相同的树前，就连路人也是一般。他们长着和疯狗记忆一样的面孔，穿着和疯狗记忆一样的衣服，露出和疯狗记忆一样的眼神。他们匆匆离开，团聚在一堆，合掌地说：原来不是我们这的恶狗。疯狗的心明亮了，按照上苍的旨意走进一所湖边的茅屋，就好像走进一个黑洞，黑洞里有个东西碰了一下。等到疯狗的眼睛适应屋内环境后，那人也从吊床上跳下来，站在对面，睁着巨卵般的眼球，紧咬着浅薄的唇线。山岩般的鼻子正往下呼吸气。疯狗一下看到了自己，可是在这短暂的熟悉以及奇异感过后，后边汹涌而出的却是陌生的陌生和羞愤。疯狗不知如何自处，如何开口，总算阖了上眼，盖住那巨卵般的喉球。他才笑着说：看来真有个一模一样的我。对面的人也魅力笑了，说：不是做梦吧？我也受了启示，也要去捉你的。疯狗说：不是梦，是真的。说完这话，疯狗忽然意识到什么，待要出手，对方的手尖已伸到喉口。疯狗呼吸哮喘了几口气，猛然就醒了，他看了看四野，四野已被浓云吞起来，山峰和树木变成深灰色的影子，远方有闪电像颤抖的舌信延伸出来，后来……雨水像马蹄践地而去，草坪、树林、山隘升起乳白色的雾气，天空大亮，辽阔而寂静。在这梦境的尽头，疯狗左手执矛，右手扶膝，坐在还积着水的石头上，一动不动。他想起自己注定要和那个叫恶狗的人共死一次。恶狗会坐在远处的某块石头上，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这样的路程也许很短，但是两个有力的人相向而走，就用不了多久。汇合点也许是个开阔的平地，也许是个局促的山凹，也许是条河流，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同时看到漆满毒药的箭头飞向自己的眼窝，同时看到磨得发亮的矛头扎向自己的心窝。也许恶狗将死掉，也许疯狗将死掉，也许都死。但是死亡并不可怕，落毒也许比死去更凄寒。那就走吧，疯狗摸了下鼻耳，挂挂腰间的湿透的兽皮，握长矛，向前迈，赤身裸体地向森林深处走去。大颗的雨滴还在晶莹的树皮上慢慢往下滑，一些由于开始叫起来，巨足在泥窝里踩出哒哒的响声来。走了有一阵，疯狗的脚步轻起来，有时他甚至还在地上，听是不是有强悍的脚步声传来。可是他什么也没听到，对方和自己一样兴高采烈。疯狗在意识到可能的错过后，将握着的长矛提起来举在肩上，他想在第一时间看到恶狗后，自己也是一个勇士，接着将长矛投掷出去，然后再躲藏在什么东西后面，恭迎恶狗。他这样想，心跳很快，呼吸喷粉，好似世界的边缘越来越远。终于走到林间一个开阔地时，对面林丛的鸟儿扑喇喇飞了。未了，恶狗惊动了这些迫近归来的鸟儿，他的智慧上海三所书店到林里，却又不知被什么力量拉到阔地中央，在那里他朝天望去。他看到了此生没见过的东西。看到了传说中没出现过的东西，一只房屋大的蜻蜓。蜻蜓长着平坦而规整的腹部，翅膀在一起，正依靠着圆圈的翅膀将自己背黑色的身躯悬滞在空中。翅膀发出巨大声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李相银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4

ISBN 978 - 7 - 5426 - 3000 - 1

I. 上… II. 李… III. 文学—期刊—研究—上海市—民
国 IV. I209.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5024 号

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著 者 / 李相银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张发财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40 千字

印 张 / 8.375

ISBN 978 - 7 - 5426 - 3000 - 1/I · 417

定价: 20.00 元

序

杨 扬

10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与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相关的研究并不多,除了少数几篇论文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研究的重要价值。1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方面,论文、论著增长速度惊人,涉及的材料和提供的新问题也极为丰富。通过这些研究的努力,一些原来文学史研究中遭忽略的人物、事件、现象和问题,被凸显出来。像积极介入现代文学期刊筹办活动和活跃于文学出版界的李小峰、邵洵美、陶亢德、赵景深、周黎庵等文学人物,在文学史上的活动开始受到关注。因为这些人以及与这些人相关的文学活动、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细节的披露,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的既定理解,开始重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图景。人们除了以思想、趣味、社团、流派等参照标准来划分作家作品之外,也尝试以期刊类型和出版机构的选择标准来分类作家作品,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作家作品类型和泰东书局作家群体创作等分类。这样的文学史理解,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文学史发展进程中,出版、传媒等现代因素对作家作品的塑造作用是有帮助的。与此相关的,是原来在文学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也受到重视。如稿费制度和职业写作等影响现代文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建构问题,随着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的深入,也被提出来了。现代文学与

传统文学的分化,过去的研究都集中在文学观念上展开,而随着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的深入,人们也看到了传统与现代分化除了思想意识之外,还有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现代文化形式、现代文化需要和现代文化市场的出现对传统的冲击。上述研究的发展,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以来,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研究材料的处理上,都有了某种改变,这种改变,有的人喜欢笼统地以文化研究来概括,其实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至少,这种概括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这 10 多年来依靠自身的学术努力给这一学科带来的新气象。

受新世纪以来新的学术研究风气的影响,陈树萍对于北新书局的研究,李相银对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的研究、王鹏飞对于上海“孤岛”时期文学期刊的研究以及王京芳围绕邵洵美而展开的对于时代出版公司的研究,从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方面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这些研究的对象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对研究对象当年所处的历史状况极为关注。或许正是这种共同的关注,影响到他们的研究首先不是立意在理论方法上要有有什么大作为,而是很老实地希望通过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来唤起人们对文学历史的某种想象。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挖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我所了解的,他们对一些活着的相关当事人进行过多次采访,有的当事人过世了,他们就走访其后代,从中搜集到大量宝贵的材料。还有,他们充分利用上海图书馆、档案馆在保存现代文学期刊和出版机构原始材料方面的有利条件,查阅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研究方式原本应该是文学史研究所必须具备的,但近些年来,却显得极为不易。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花费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然后研究成书。陈树萍等四人的论著都是作者花费了数年之力,在大量阅读、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材料之丰富详实是可以想见的。

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在他们之前,对北新书局、时代出版公司、“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和沦陷时期的文学期刊研究,几乎是空白。在

这样的条件下要建构出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学史想象,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挑战。眼下这些学术成果得以出版,表明出版机构是接受和认同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我相信,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学术界也一定会对他们的研究给予积极的关注。

2008年9月

目 录

序	杨 扬	1
导言		1
第一章 禁锢与自由:在汪伪文艺统制下		17
第一节 汪伪对上海文艺界的控制与利用		18
第二节 “带着镣铐跳舞”:沦陷时期的文学生产		37
第二章 依附与遣愁:亲汪文人的文化姿态		
——《古今》研究		58
第一节 避俗趋雅:编辑理念与文化取向		59
第二节 同气相求:《古今》文人的聚合		76
第三节 自怜自辩:尴尬暧昧的政治心结		91
第三章 引导与培植:左翼文人的文化使命		
——《杂志》研究		108
第一节 生存策略:“中立”姿态与使命传达		108
第二节 现实关注:文艺批评与报告文学		128
第三节 最美的收获:《杂志》上的张爱玲		145

第四章 趣味与意义:通俗文学期刊的旧调新声

——《万象》研究	160
第一节 前后期编辑方针的变与不变	161
第二节 通俗文学合法性的寻求	174
第三节 新文学作家言说空间的重建	192
附录一 汪伪文艺统制与上海沦陷时期文艺报刊出版事略	202
附录二 《古今》目录	223
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56

导 言

作为一个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大学中文系课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史维度的巧合使得它在新政权的确立过程中要担当起解释、说明其合法性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重写文学史”讨论的逐渐深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经历了确立与解构的反复。前人有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谁能代表时代?哪部作品堪称经典?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家们不断地为读者开书单,但是差异却越来越大。在不断的解构与颠覆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呈现出多元性。王瑶、唐弢、钱理群等人的文学史各有建树,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仍然处于变革之中。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进路何在?变革何以成为可能?

—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以为应当首先厘清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思路。无论是1950年代还是1980、199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都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回声。1950年代新文学经典的形成直接印证了福柯的论断:“在人文学科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大对

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①徐志摩、梁实秋、周作人、张爱玲、苏青、钱锺书甚至是沈从文都从文学史上消失了,这些作家作品大都在1980—1990年代经历了文物出土般的过程,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成为当下重新认定的经典。也许,1990年代以后作家作品经典的选择反映出知识权力的某种独立性。但是,从来就没有纯粹的独立性。对于这批作家作品的刻意强调正是对1950年代经典标准的颠覆。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日新月异”,其关键即在于游移不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总体而言,其标准从文学外部转向文学内部,经历了与意识形态的相得与相离的过程。其结果便是容易导致两个极端:“一是理想主义地认为艺术具有语义和美学上的自由性;二是就历史延续性(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通常被视为是有结构性的)而言对艺术进行一种社会批评性的评价。”^②前者强调的是艺术的自主性,后者重视的是艺术的社会功用性。但这两者并非没有共同点,约·舒尔特-萨斯认为:“两者都相信存在一种表现美学价值并能够组织意义的艺术。两者都认为,意义和美学价值之间存在一种根本的、必不可少的联系,即使它们中的一个和另一个相比更趋向于把意义和意义的背景分开。”^③

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评价标准正是在这两个极端中游移。文学评价“向内转”的结果是文学史研究重视文本的细读,注重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从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转向对文学自主性的强调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文学场”^④中,意识形态始终是无法忽略的因素,对它的一味抵制是否也是一种非理

① [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② [美]约·舒尔特-萨斯:《文学评价》,《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

③ [美]约·舒尔特-萨斯:《文学评价》,《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第384页。

④ [法]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277页。

性的态度？其实，在抵制的背后仍然是意识形态忽隐忽现的身影。

文学的自主性是否必然以疏离意识形态为旨归？如果意识形态以一种阴郁、压抑的力量渗透到文学创作中时，那么文学会发生何种反应？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在此显示出了它的特别。当国统区、解放区的作家们与抗战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实验立刻变得不相干了。文学完全走向了现实生活——不再是琐屑的个人经历，而是整个民族的经历”。^①而在日伪统制下，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则被抛出了民族国家的轨道，飘然于阴霾的城市上空。虽然没有单纯明朗的轨迹，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法预料的另一种意味深长的印痕。被异族奴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屈辱的一页，现代知识群体在此期间经受了政治与道德上的最严峻考验，或隐秘或显明的动机使他们分化为暗藏不同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乱世之中他们将如何借助文学发声？又会发出怎样的声音？不同的政治倾向与文学理念自然会导致他们做出不同的选择，也许这些选择是错误的或者说是懦弱的。然而，对之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并非一种正确的历史态度，以政治作为文学的唯一评价标准未免感情用事，所谓“不因人废言”才是正道。在面对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时，不应该仅做简单的政治与道德评判而有意忽略与汪伪政权有染的文人的写作，也不应站在单纯的新文学立场上而忽视通俗文学在当时的巨大存在。本书无意于做翻案文章，之所以将亲汪文人^②、左翼文人、通俗文人以及其他文人在此时的文学活动放在同一层面予以论述，目的在于探究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及其复杂意味，从而整体呈现其生动丰富的面貌。

①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4页。

② “亲汪文人”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人物：一、汪伪政要，如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江亢虎、朱朴等；二、与汪伪政权及汪伪政要有密切来往的文人，如周作人、龙沐勋、周越然、陶亢德、周黎庵、柳雨生、苏青、张爱玲等；三、在前者所办报纸期刊上经常撰稿的文人，如予且、金性尧、谢刚主、瞿兑之、谢兴尧等。“亲汪文人”的政治倾向虽不完全一致，与汪伪政权或汪伪政要发生关系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大体是默认汪伪政权的“和平”理念的。当然，这一问题仍需要具体分析。

文学史写作不必囿于某一种意识形态、文学趣味或某一种文学视角。文学史也不应当只是文学的历史,法国波尔多文学社会学学派的代表人物罗贝尔·埃斯卡皮认为多年的文学史写作仍局限于作家作品研究上,“而把集体背景看作一种装饰与点缀,留给政治编年史作为趣闻轶事的材料”。于是,“真正的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明显地被忽略了……历史的深度仿佛在一块二维屏幕上被压扁了;文学的事实因此受到扭曲。”^①德国著名文学史家赫尔穆特·绍伊尔则更进一步,将文学视作一种“社会产物”,指出文学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认为“只有在历史这面镜子中,一种审美现象才能获得其价值”。^② 当他将历史作为文学的镜子时,便是强调了文学的历史境遇。如果将文学史写作视为历史叙事,那么意义与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追问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面孔也许更有意义。因此,文学发生时的场景成为文学史写作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就本书的选题而言,上海沦陷后文学生产的历史境遇便是考察的重要环节之一。以翻译著称于世的傅雷于偶然之中道出了个中真相: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会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是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③

上海沦陷时期(1941年12月8日—1945年8月15日)虽说只有三年零八个月,却是上海历史上最为特别的时期:军事上由日军占领,

①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② [德]赫尔穆特·绍伊尔:《文学史写作问题》,《重解伟大传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③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三年第十一期,1944年5月1日。

政治上由汪伪政权统治,思想文化上则在日伪当局主导下开展“东亚新文化运动”。所谓“东亚新文化”乃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目的有二:一是挑战蟠居重庆的英美文化,二是反攻巢食延安的共产文化。^①为此,日本侵略者与汪伪政权紧密合作,集中双方文化力量,共谋文化发展的新路径。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上海自然是日汪推行“东亚新文化”的主要地域。

晚清以降,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所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二十余年的发展,西方文化已经获得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认同,植入中国现代文化的肌体内部。日汪将文化视为政治附庸与战争工具,选择与五四新文化背道而驰的复古的文化路径,意在割裂沦陷区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此种路径的选择对上海现代文化的发展无疑造成了极大伤害。由政治与战争造成的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阻隔使沦陷时期的上海形同一个文化封闭圈。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生产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

二

布迪厄认为:“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等等)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权力场是各种因素和机制之间的力量关系空间,这些因素和机制的共同点是拥有在不同场(尤其是经济场或文化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必要资本。”^②在这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里发展起来的文学,由于受特殊的政治权力与文化力量的制约,必然有着迥异于其他地域、其他时段的文学现象。

汪伪政要的散文写作热便是沦陷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朱朴、赵叔雍等人在这个时段仿佛文学青年一样,突然萌发了强烈的散文写作欲望。宦海沉浮数十年的周佛海开始

① 《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改组成立大会》,《文协》创刊号,1943年11月。

②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63页。

“追忆似水年华”，其《往矣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出了十二版，销售两万余册，创“出版界所仅见之记录”。^①对于这一本传记体的散文集，周黎庵颇能慧眼识金：“在作者只是想到几个题目，随意挥洒的写成几篇文章，然无意中却把他半生的经历都写了出来，既没有体裁的拘束，又不似写自传的人一本正经，意在传之后世，所以下笔时的自由和笔调之亲切，实驾一切传记文字之上”。^②周佛海当时位高权重，周黎庵的点评难免有逢迎之嫌，但以“春秋大义”为准绳的刘心皇认为此说“并不过誉”。^③《往矣集》中的诸多篇章与汪精卫的《故人故事》、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梁鸿志的《爱居阁坐谈》、赵叔雍的《人往风微录》等多是忆旧清淡之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文热。

对汪伪政要而言，他们的写作既非为了“稻粱谋”，也难说全然是为了掌握文学话语权。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他们似乎是散文写作的“票友”。然而，这些“票友”绝非“玩一票”那么简单。他们之所以忆旧说往，一方面是为了遣愁寄情，另一方面则是企图以个人的光荣历史唤起民众的记忆与同情。由于背离了抗战的主流民意，无法取得合法性的汪伪政权形同无根之萍，大大小小的汪伪官员也在风雨飘摇中彷徨无定，就如周作人所说，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不很好的境地”，仿佛“洪水在后面”。^④感怀没落的昔日的光辉，既是对历史的荣光的追寻，也是对尴尬现实的无言。隐约可见的是其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忧虑：总有一天要面对末日审判，然而不知道这末日何时到来。他们可以在政治上为自己寻找某种合法性的辩护，但是他们无法面对民族的历史，几千年来的史书已经昭示了他们在民族历史中的“贰臣”地位。就此而言，他们的文字实际上是面对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发言。通过这些感性的回忆文字，他们试图将永久丧失了的东西召唤回来，一遍遍的往事记忆不

① 《〈往矣集〉第十版出版广告》，《古今》第55期封底，1944年9月16日。

② 周黎庵：《往矣集第十二版跋》，《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1944年版。

③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9页。

④ 周作人：《〈文抄〉序》，《古今》第54期，1944年9月1日。

仅是要让当时的读者,也是要让未来的人们在文字中认同自己。忆旧因此成了他们的精神皈依,文学就此成为他们精神生存的一种方式。

由这群世故练达的男人背后走出来的是果敢泼辣的苏青,她是这个灰色的男性世界里的一抹嫣红。她所坚持的“女子写作”是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又一显著现象。与政治结缘的男人们已经难以挣脱权力的诱惑,暧昧的文字悄悄传递着言外之意。与政要们的婉曲伪饰不同,苏青大胆而率真,以惊世骇俗之言论解构了道貌岸然的男性世界。

苏青的《结婚十年》之所以能在出版半年内再版九次,成为上海沦陷时期的畅销书,凭借的是她的女性性别意识与言说冲动。“在男性主流文化废退、消失的缝隙间,在异族统治所造成的民族、男权的历史压抑力被阉割、被削弱的时间的停滞处,苏青获得了直白地讲述一个女人的真实故事的可能。”^①苏青把读者的目光从男性的政治故事引向了女性的经验叙述:“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②于是,对“老中国之女”^③命运有着深切体验又经受了西方文明吹拂的苏青不再奢谈平等、独立,而是逼近沦陷区女性生存的现实处境,描绘她们的尴尬、压抑、屈辱、抗争与追求。身为独立的现代女性,苏青尽管以文字解构了男性的威权,但无意凌驾于男性之上,而是做着与男性携手同行的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苏青身为女人的醒世明言,对男人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失去女性自我。在苏青看来,只有懂得了何为男人何为女人,才能为女性准确定位。当年的苏青并不明白今日所谓的“生态女权”,但她无疑是在男人与女人的生态平衡中定位自我的。放弃了激烈的性别对抗的苏青于是发现了现代知识女性的悖论:女性独立、平等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云端,而女性还站在土地上,丝毫不能提升半步。于是,她只好低下头来注意脚下而不是天

①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② 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苏青文集》(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③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222页。

上,也许这样可以得到尘世的幸福。因此,苏青的女性意识是适度的,而非女权的,这也是男性可以慷慨接受的批评与要求。这个女人在乱世的夹缝里发出的是“清朗的语流”^①而非令人厌恶的声响。于是,男性为了表示尊重,而暂时放弃“宏大的叙事”,在她的《天地》里一起谈谈家长里短。苏青自身的经历便是验证,在男性世界里游刃有余的她得到了男人们的另眼相待,不仅是陶亢德对她表示了好感,即便是陈公博也不掩饰赏识之情。^②

上海沦陷时期的最大“传奇”是张爱玲的出现。如果说苏青的整日忙碌是迫于生计,那么张爱玲则忙于实现自己的“天才梦”。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在登上文坛半年后便成为最被看好的女作家,不仅作品被人称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③本人还被视为“鲁迅之后有她”。^④小说集《传奇》问世后不到四天便一售而空,一个月后再版,此种情景令其他文人惊羨不已。

与苏青小说的自叙传特征所不同的是,张爱玲不会在小说中叙说自己的心路历程。她无须像苏青那样急切地喊叫,而习惯以冷静旁观的态度描写败落家族的旧精魂,在咿咿呀呀的胡琴声中回味三十年前的旧事。当然张爱玲的忆旧不是为了遣愁寄情,也不是为了怀古伤今,而是源自于隐秘的家族记忆。就这点而言,朱门绣户的生活为张爱玲提供了其他作家所无法企及的写作资源。无论是白流苏(《倾城之恋》)、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还是姜长安(《金锁记》)、郑川嫦(《花凋》),这些旧家族的女子身上都闪现着张爱玲对于家族的记忆片断。

在张爱玲的“记忆”中交叉着现在时与过去时,这是由创作时的语境与心境决定的。这个时代正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们对日常的一切充满恐惧,即便是跻身于上层社会的张爱玲也有被时代抛弃的感觉,

①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217页。

② 苏青创办《天地》月刊时曾得到陈公博的慷慨资助。陈公博任伪上海市市长时,曾安排苏青任伪市政府职员。

③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三年第十一期,1944年5月1日。

④ 胡兰成:《评张爱玲》,《杂志》第13卷第3期,1944年6月10日。

“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因为“这比瞭望将来更明晰、亲切”。^①现实是晦暗残缺的,未来是渺茫飘忽的,似乎只有安详静穆的过去才是真切实在的。优渥的现实生活固然令张爱玲衣食无忧,但在战争废墟之上的写作又怎会不沾染时代的凄惶无奈?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对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张爱玲虽无意成为战争的描摹者,但亲历了香港之战的她对战争显然有着特别的体验:“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②“时代是仓促的,已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③鲁迅曾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思痛之后的。”张爱玲在不能畅言战争的时刻更能领悟战争所带来的毁灭,积淀的战争痛苦转换为文明的忧虑。尽管张爱玲无意于写“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但她以参差对照的手法勾勒出的“苍凉”人生无疑是这个急遽慌乱的时代写真。

上海沦陷为张爱玲的出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新文学家撤离留下的巨大的文学空间,也在促使着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话语的转变,它显然无法接纳新文学的启蒙话语以及1930年代的革命与救亡话语。逸出了启蒙、革命、救亡话语框架的张爱玲不再将白流苏等人刻画为现代知识女性或革命女性,在张爱玲的“传奇”里,有的只是凡夫俗子,都是负荷着时代的“软弱的凡人”,他们虽“不及英雄有力”,却“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④

通俗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也是这个时期颇受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这一时期致力于通俗小说创作的除了张恨水、程小青、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等老派文人外,还有丁谛、予且、谭惟翰、谭正璧等新通俗

①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② 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65页。

③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135页。

④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175页。